

为了莎士比亚

刘炳善 著



WEI LE SHA SHI BI YA

为了莎士比亚

刘炳善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莎士比亚/刘炳善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

(读莎楼小书)

ISBN 978-7-81091-951-7

I. 为…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6170 号

责任编辑 程若春

责任校对 文 增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24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1	小引
2	习莎之路
11	蕾蕾和我们的莎士比亚词典
12	(一) 蕾蕾
16	(二) 我的梦, 我的命运
20	(三) “天作之合”
23	(四) 诺言
25	(五) 品西瓜和烤白薯
29	(六) “磨合”
33	(七) 两个人的梦
37	(八)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



40	(九) 寻找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43	(十) 从寻找莎士比亚词典到自己编莎 士比亚词典
46	(十一) 自我论证一
52	(十二) 自我论证二
54	(十三) “主编”和“助编”
58	(十四) “正编”和“续编”(上)
62	(十五) “正编”和“续编”(下)
69	(十六) 一幅莎士比亚画像的来历
73	(十七) 结束语
77	为了莎士比亚(1996年赴美杂记)
119	附:家信
129	莎士比亚与曹雪芹
139	改编——莎剧的基本创作方法
156	莎剧演出中国化
177	莎士比亚的春天将在中国出现
193	从一个戏看莎翁全集的两种中译本
217	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小 引

这本小书所收入的是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包括一篇长文《蕾蕾和我们的莎士比亚词典》。它如实交代了我们如何用 20 年的心血劳动,编出了一部《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意在为中国学生消除阅读莎士比亚原文中的语言困难。中华莎学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道路,而且还要在新的世纪中进一步发展。我们愿为此稍尽绵薄之力。

2009 年 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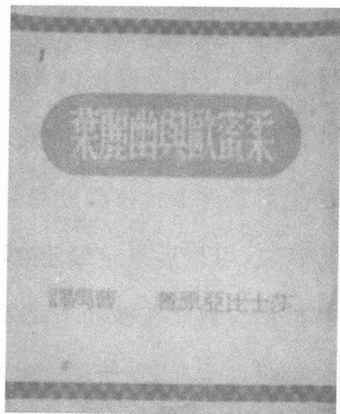
习 莎 之 路

——为《莎学故事》而作

我对于莎剧的爱好开始于高中时代。从英文课本里读了兰姆姐弟《莎氏乐府本事》中《威尼斯商人》一篇，此后就忘不了鲍西娅向巴萨尼奥 sent speechless messages(眉目传情)和夏洛克向安东尼奥要 a pound of flesh(一磅肉)。当时，《裘力斯·恺撒》中勃鲁托斯和安东尼的两篇著名台词，同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一起，作为“模范演说”，在同学们当中传诵，后来我才知道那两段富有鼓动性的演说其实是莎士比亚的创作。但读了为之大为入迷的第一部莎剧却



是曹禺翻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它使我第一次像蜜蜂吸取花蜜似的享受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甜美芳香。那是我生平感受到的最大艺术享受之一。



曹禺译《柔蜜欧与幽丽叶》书影

上大学后，1947～1951年间，兴趣极浓地阅读了一大批原文英国文学作品和英文《圣经》。当时最大的赏心乐事是坐在嘉陵江畔的石栏上品读《金库诗选》、《彭斯歌谣》和 *Romeo and Juliet*。从此就萌发了攻读莎剧全集的志愿，曾借助于 C.O.D (《简明牛津字典》) 和一些单行本的注释细读 *The Oxford Shakespeare* (《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打算计日程功把它通读一遍。可惜生活动荡，未能如愿。值得一记的是：1949年夏，由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上了黑名单，为躲开魔爪，匆忙离校，走时抓了一本 Innes 编注的 *Julius Caesar* (《裘力斯·恺撒》)，到同学家避难。此时此际潜心研读这一莎剧，感受特别深刻，除了通过原文重温那两篇精彩的演说，心中铭记下勃鲁托斯的崇高形象。

大学时期还有两件事与莎剧学习有关。一是曾受教于朱



生豪之弟朱文振。朱文振先生也是一位莎译家,受朱生豪遗命续译出其兄未及译出的几部历史剧。他的译稿采用中国传统戏曲的语言来译莎剧,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曾目睹他在清苦的生活条件下日夜勤勤恳恳从事莎剧翻译,译稿一再修改,十分认真(可惜后来全毁于“文革”之中)。另一件事是曾在重庆解放前夕偶然在沙坪坝商务印书馆碰见孙大雨译的《黎玕王》。这部书两大册,上册用大字印译文,书前有长序《论素体诗》(记忆中印象如此),下册选译《新集注版》(*New Variorum Edition*)的详注。这在当时中国是仅有的一部体大思精的莎译精品,但因时局关系竟躺在书店的角落里无人过问。我独自把它摩挲翻阅良久,爱不忍释,但一看定价五元大洋,无力购置,只得怅然离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结束学生生活,走上工作岗位,先从事戏剧活动,后到大学教英国文学。由于工作需要,重新拾起莎剧研习。从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叶,北京、上海尚存有不少外文旧书,零星购得一些较好的莎剧单行本,像 E. K. Chambers 编注的 *Hamlet*, K. Deighton 编注的 *Macbeth*, A. W. Verity 编注的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和 *As You Like It* 等,都是切实有用之书。还从开封冷摊买到 Dr. F. J. Furnivall 在世纪之交编订的 40 本一套全集。学校里也有各



种全集的散本，如 *The Yale Shakespeare*, *The Penguin Shakespeare*, 等。此外，从同事那里借来诗人于赓虞的遗物（他留学爱丁堡时所购并细读过的）——W. J. Craig 编订的 Arden 版 *Hamlet*，这是我长期以来所遇到的最好版本，遂将其中的详注摘要转抄到 Dr. Furnivall 的本子上。当时个人身处逆境，靠着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再次研读了一批莎剧。同时也研读了一些莎评名著，如 A. C. Bradley 的 *Shakespearean Tragedy*（《莎士比亚悲剧》），G. Gordon 的 *Shakespearean Comedy*（《莎士比亚喜剧》），J. Palmer 的 *Political 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莎士比亚笔下的政治人物》）和 A. Thornduke 的 *Shakespeare's Theatre*（《莎士比亚时代的剧院》）。此外阅读了苏联学者莫洛佐夫和阿尼克斯特关于莎士比亚的论著。在中国学者的著译中，主要阅读的是卞之琳的《论〈哈姆雷特〉》和他的《哈姆雷特》译本。特别喜爱的还有吴兴华的《亨利四世》译本，因为译者学识渊博、才气横溢，把剧中的市井俚语、流氓黑话、插科打诨，都译得非常生动传神（可惜这位杰出的莎译家已死于“文革”之中）。在这一时期的研习中非常希望找到孙大雨译的《黎琊王》，特别是解放前夕出版的那一种附有详注的版本，但未能如愿——这部名译在解放后好像一直没有出过，直到 1993 年才在上海问世。（我很幸运地在该年夏天拜访了



孙大雨先生，他热情接待了我这个后学者，在我带去的他的两部莎剧译本扉页上签了名，并且让我看了他翻译莎剧的主要依据：New Variorum Edition的八种莎剧和 Schmidt 的《莎氏用词全典》。）

这样，在困难条件下经过数年对于莎剧的研习，于 1964 年编写出讲义“英国文学简史”中“莎士比亚”一章。它作为教材，虽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个人集纳、组织、概括、改写而成，但其中凝聚了个人对莎翁的热爱以及将莎学知识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中国学生的诚挚愿望。

“文革”十年，莎学中断。1978 年冬，中国高校恢复了英美文学课程。1981 年，我编的《英国文学简史》出版，在当时暂弥补了这门教材的空缺。此后本想将研习重点转向莎士比亚，但因过去长期政治运动的折腾，加上为编写、修改《英国文学简史》而取消休息，连年伏案工作，健康受损，倘猛然转入沉重的莎学，深恐力有不支。因此冷静考虑，从 1982 年起转向英国散文的翻译研究——这一课题同样为我喜爱但分量较为轻松。

在英国散文研究中，曾翻译鲁卡斯(E. V. Lucas)的《葬礼》(A Funeral)一文。其中提到爱尔兰莎学家克莱喀(W. J. Craig)生前曾编纂一部新的莎士比亚字典，但他去世时只留下字迹难认的一部手稿，未能出版。对此我深感遗憾，希望这部



字典手稿在英国能够妥善保存,或有一日出版,对所有莎剧学习者有用。

1986年的中国莎剧艺术节是一件大事,它把推广莎学提到“提高我国民族文化素养”的高度(见上海《解放日报》1986年4月11日社论),并把莎剧演出与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结合起来,尝试采用中国传统戏曲形式改编演出了几个莎剧。当时我在上海,看了用昆曲演出的《麦克白》——《血手记》和越剧《第十二夜》,受到很大鼓舞,并感到一旦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将能促使中国的莎学研究、莎剧翻译、莎剧演出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向前发展。

莎剧艺术节点燃起我久藏心中的对于莎剧的热爱。从上海回开封后,接连写了三篇文章:《莎剧演出中国化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代表我对莎剧艺术节的直接体会;《莎士比亚与曹雪芹》(《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对比了这两个伟大作家的生平身世和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他们作品的曲折命运;《莎剧与改编》(《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则从莎士比亚如何通过改编进行戏剧创作并获得辉煌成功的经验,探讨一下改编对于一般戏剧(包括电影剧本、电视剧)创作的意义,以便我国剧作家汲取一些借鉴。

诗人徐迟曾说:攻读莎剧,必须有专门工具书和好版本。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内地的大学里简直找不到莎学基本工具书,也很少看到好的莎剧版本,只有一些廉价版单行本小册子和中译本。这对于学习研究莎剧非常不利,也是个人在摸索学习中所感到的最大问题。因此 1987 年当我在上海旧书店买到一本英国出的 *A Pocket Shakespeare Lexicon* (《袖珍莎士比亚词典》) 时,真是喜出望外。这本小书印刷精美、插图珍贵,是我弄到手的第一本莎剧工具书,多日把玩,爱不忍释。然而,真正拿它用于攻读莎剧原文,又感到远远不够。此时忽然灵机一动,产生一种首先为自己、同时也为有志于攻读莎剧原文的中国学生编出一部《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的想法。这一想法经过两年的考虑酝酿和资料准备,并征求了北京的李赋宁教授、冯亦代先生和三联书店沈昌文经理的意见,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终于形成一份计划书,大意是:

“当前中国莎学实处于青黄不接之势:老一代专家早年学养丰厚,故硕果累累、驰名海外,但对于一般英语专业学生和青年学者来说,莎剧原著仍为一部封闭的‘天书’。根本障碍在于莎士比亚用词的特殊性。盖莎士比亚生当四百年前,其



莎士比亚像



所使用的语言为处于中古英语向近代英语过渡时期的‘早期近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词形和词义与当代英语差别甚大。同时,莎剧还包含伊丽莎白时代的大量俗词俚语。这些构成了我国学生阅读莎剧原文中的极大困难。近一百多年来国外虽出有莎士比亚词典,但或者篇幅庞大、查阅不便,或者内容简略、不够使用。因此,很有必要根据我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出一部繁简适当的莎士比亚词典,以解决我国学生攻读莎剧原文中的语言困难。具体做法是对于《莎氏全集》原文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进行挑剔筛选,挑出所有难解词语,根据国外可靠文献资料,一一注明释义,并列举莎剧原文例句,两者都译为中文;用此方法积累大量词汇卡片,按字母顺序分类排比,删去冗繁,利用电脑合成,编成一部简要浅显的词典,前有导言,后有附录。我国学生得此工具书之助,可以扫除攻读《莎氏全集》中的‘拦路虎’。这对于在中国普及推广莎学当会有很大好处。”

实际上,国际莎学界也非常需要一部新的、繁简适当的莎士比亚词典。但那主要是英美或欧洲的学者如何考虑的事。为中国学生着想,目前迫切需要在外国学者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19~20世纪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出一部《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这对于培养年青一代的中国莎学家和莎译家是至关重要的。



这部词典的编纂工作在 1989 年冬开始。8 年来,在亲密助手的大力合作下,以拼搏精神夜以继日工作,已积累词汇卡片 40 000 多张,并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框架已经形成,前言和附录也已写出。词典可望于近期出版。我想用这部词典为祖国的文化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目的在于呼唤 21 世纪的中华莎学振兴。

词典工作之余,曾利用已做出的词语卡片进行莎剧教学,向研究生教了《第十二夜》和《麦克白》二剧。学生反映学习后不但从语言上弄懂了这两个剧本,而且在此学习基础上知道如何进一步学习其他莎剧。

此外,还挤时间比较朱生豪和梁实秋的两部莎翁全集译本,写了论文《莎剧的两种中译本:从一出戏看全集》,先后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读书》(1991 年第 11 期)和《中国翻译》(1992 年第 4 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这就是中国内地的一个学人如何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在困难的工作条件下,一方面自己刻苦研习莎剧,同时也在尽力设法帮助学生们学习莎剧的平凡故事。

1997 年 4 月 16 日,开封



蕾蕾和我们的莎士比亚词典

——书背后的故事

恩格斯曾提到：在历史发展中，许多不同走向的力量会形成一种“平行四边形”似的合力，这种合力推动历史采取了既不依这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依那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某种走向，促成了某一事件的产生。在我个人的平凡经历中，也碰到来自种种不同方向的因素，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促使我下决心要编一部我长久想望的莎士比亚词典；而倘若没有蕾蕾的参与，我自己一个人



也不可能编出这部词典。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需要慢慢地讲。

(一) 蕾 蕾

蕾蕾是我妻子的小名，她家里的人，爸爸妈妈、阿姨舅舅、哥哥姐姐都这样叫她。我和她结婚以后，也这样叫她，以至于今。

蕾蕾 1948 年出生于上海。她父亲是上海新闻界一位前辈，《文汇报》创办人之一；母亲是毕业于暨南大学的大家闺秀；姐姐姐夫是北大的硕士和博士；哥哥嫂嫂也都是大学毕业——总而言之，这是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新中国成立，她父亲到外贸部工作，蕾蕾随父母到了北京，进了幼师附属幼儿园，至今还记得坐在接送孩子们的“小房子车”里，和小朋友们一齐调皮地高喊“季叔叔，加油！关叔叔，加醋！”与另一个车里的小朋友比赛。巧的是，她当时的照片还上了《人民日报》。

《文汇报》复刊，他们全家又回上海。她在上海上小学。

从老相册中，我看过蕾蕾小学时代的照片：依偎在父母身边，梳着两根短辫儿，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圆圆的脸，是一